

白春雨 著

儒家诚信之德

及其现代意义

以四书为中心的阐释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白春雨 著

儒家

诚信之德

及其现代意义

——以四书为中心的阐释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科建设基金资助项目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诚信之德及其现代意义——以四书为中心的阐释/白春雨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5311-6800-3

I. 儒... II. 白... III. ①儒家—道德修养—研究 ②四书—研究 IV. B82—092 B2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3721 号

儒家诚信之德及其现代意义

——以四书为中心的阐释

白春雨 著

出版·发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经销/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刷/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176 千

版本/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 册

社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维力斯大厦 9 层

电话/(0471)6608179 6608165 邮编:010010

网址/<http://www.im-eph.com>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 978-7-5311-6800-3

定价: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内蒙古教育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一

潘富恩

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可谓是艰难曲折的,进行儒学研究的学者被人冠之以不识时务。这就造成了不仅西方人对中国的儒家文化不了解,就连中国人自己对于我们赖以成长的传统文化资源也知之甚少。从历史的脉络上看,儒家文化受到贬黜、冷落甚至否定,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必然结果。然则,一个人的自尊应该是从维护自己的文化开始的。在自己传统的精神资源的基础上的对话才是有效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儒家诚信之德及其现代意义》,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对诚信之德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梳理。尽管年已七旬,我还是一口气将之读完,一个字:爽!宛如饮了一杯百年老窖,醇香四溢……

本书对儒家诚、信道德范畴的阐释是以“四书”为本,而又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宋代新儒家对诚信道德范畴新的义理阐发的依据。诚信的范畴在“四书”里是上下贯通、内外圆融、互为印证的,为此通过对儒家原典的探究,方能溯本求源,阐幽索隐,进一步深切理解本义,这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基本功夫。《四书集注》是统治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达七个世纪的官方哲学——理学的代表作之一,本书作者据此说明儒家诚信观的演化过程,不仅有着历史的连续性,还增强了立论的可信度。在资料的收集、考辨、爬梳上,本书的作者是用过功夫的,对近人有关研究成果也予以关心并结合到论著当中,从其中我们能够获得某些有益的启发。

学界对儒家诚信之德的关顾并不新鲜,但是如何基于现实,并通

过揭露以韦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有关诚信观念的误解乃至污枉,系统地以儒家经典“四书”为基础,全面阐发儒家诚信之德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一研究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在国内外还是第一次。目前学界对儒家诚信之德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却多半就其作为一道德德目或在规范要求上做出说明,这也是受到西学研究的影响。本书在系统梳解“四书”的基础上,不仅揭示了儒家诚信之德作为人们的道德实践的超越根据的本体论的特质,而且呈现出它作为道德实践的工夫论。更重要的是,本书还从立人之本与立政之本的角度,从内圣与外王两个方面来说明儒家诚信之德的层次与规模。人们通常认为,今天的市场行为与诚信之德之间是一种外在的相互制约的关系,本书从市场失灵的理论分析和中国传统育人的历史例证中说明,讲求诚信与实现市场效率和利益的最大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一观点对于改善我们有关诚信之德的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本书结构合理,环环相扣,紧紧围绕着诚信这个中心展开论证。在《论语》里说明了仁与信的体用关联,在《孟子》里阐明了心体(四端)与诚信的关系,在《大学》里叙述了修身与诚信的相关涉,在《中庸》里阐述了诚体的规模与义理,在对“四书”诚信进行详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儒家诚信之德的本质性特点,并把它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结合起来,诠释了诚信之德的时代价值。然而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对现代西方学者对诚信的认识没有进行对话性的比较,此一不足恰又构成了作者前进的方向,我们不能苛求作者在较短的时间里把中西方学者对诚信的理解与义理都吃透了。最后,我们有理由期待作者在这个方向进一步耕耘,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2007年春于复旦园



序 二

陈根法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迫切需要传统与现代的交流与对话。如何让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并借由对传统文化的褒扬,恢复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这是需要我们反复申诉的一个社会责任。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当中,没有无传统的现代,也没有无现代的传统。从儒家的传统文化当中,我们发现,诚信之道作为道德的基石一直伴随着我们成长。白春雨博士的著作再次提供了一个因缘,让我们能够对传统文化中的诚信之德及其现代意义有所申说之,使其因传统而现代,因古朴而光彩,那么,这一阐明便成为切近地关涉我们自身的现实生存的历史责任与任务了。

白春雨博士在校攻读学位期间,我亲见了她勤勉扎实地致力于学问,尤其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儒家经典,其所付出的努力与艰辛惟有亲历过的人才能体会个中三昧。守护思想的事业需要我们一代代人的默默地付出,惟有以扎实而详备的基本功进入群众之中,才不至于误人子弟。故《潜夫论》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在于人们不再崇尚经典,转而以大众传媒、街头巷议为能事。读经宣义,本就是以诚信契合世界的过程,“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对话的多样性及其释义学的可能性,但是对话一定要有根基的,倘一味求新求奇,篡改传统,只能给人留下笑柄。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要以诚实守信为准则,这是我们先民生活的呈现,并不是一个多么艰深的理论上的问题,而直接就是当下与现世的

生存,确切地说,是诚信之德的自我揭示与谋划。这也是诚信并不体现为某一家之专利与垄断,而是一种普遍性话语的原因所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各自从自己立论的不同方向对诚信之德进行了筹划。以兵家而言,当孙子把讲武练军视为国之根本时,其所贯穿着即为诚信载于军覆于国,其所强调的“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然,兵家之信与儒家论信有着一定的区别,兵家将信贯之于军事,儒家则将信贯之于生活。“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持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五者兼备,各适其用,则可以以为将帅。”因此,为将者使民、抚众、率军、训人必以诚信之德融入行为之中,始能号令上达下通,内外一心。故而,有了诚信,所行之事必能成功。

历史的发展使我们遮蔽了诚信的呈现。市场经济的进展在一些学者的眼中形成了传统与现代排斥的现象。有人借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证儒家学说不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建设,我们通过白春雨博士的著作,看到了传统与现代契合的一面,“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种超越的情操不是一味追逐于金钱的浮浅之辈所能体悟到的。

2007年春于复旦园



目 录

引 论	(1)
一、研究儒家诚信之德的必要性	(1)
二、为什么我们要选取以“四书”为中心来进行阐释?	(4)
三、诚信之解题及孔子以前诚信观念的发展	(10)
四、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结构	(13)
第一章 为政与守信	
——《论语》的诚信思想	(30)
一、仁与信	(31)
二、敬事而信	(36)
三、民无信不立	(40)
四、忠信之道	(49)
第二章 诚与思诚	
——《孟子》诚信观念的特点	(56)
一、四端与诚信	(57)
二、反身而诚	(62)
三、信与义之分析	(67)
第三章 诚意与毋自欺	
——《大学》的诚信修养工夫	(73)
一、意念之恶与心上工夫	(74)
二、正心与诚意	(82)
三、慎独与毋自欺	(89)
四、诚的工夫的实践性格	(94)

第四章 不诚无物

——《中庸》对诚信之道的总结 (99)

一、《中庸》的思想间架 (102)

二、由“仁”向“诚”的展开 (106)

三、诚作为道德实践的超越根据 (110)

四、诚之道德实践工夫 (119)

第五章 儒家诚信之德的时代价值 (130)

一、儒家诚信之德的一些基本特点 (130)

二、当代道德生活的危机 (135)

三、儒家诚信之德面对当今社会的转化 (142)

参考文献 (159)

后 记 (167)



引 论

本文的目的,乃试图以“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中心,从理论上阐发儒家诚信之德的义理内涵,并论及它的现代意义。

一、研究儒家诚信之德的必要性

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在现时代我们要重新认识、审视儒家的诚信之德?这一问题本身就构成了本文的问题意识,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首先,从实践方面看,人们可以非常简洁地指出,现代社会的诚信危机引发我们对传统儒家诚信之德的检讨。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指出,诚信危机乃是一个全球性、世界性的大问题。从美国的安然公司、安德生会计师事务所等系列丑闻(scandals)到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坑蒙拐骗行为,假冒伪劣产品,一点一滴,桩桩件件,无一不在时时提醒我们:现代社会生活究竟产生了什么病痛?我们的道德生活世界究竟还有没有诚信之德在发生作用?

现实生活中的虚假不实的病痛,迫使我们寻求这种病痛的根源,同时也寻求化解这种病痛的方法。明眼人不难看到,虚伪欺诈原本并非市场社会的必然结果,但却的确是市场社会不完善的副产品。市场社会是这样一个经济系统,它完全建立在成本核算、投入——产出的基础上,个人被了解成被市场模式(market model)规范了的“经济人”,这样一种“人观”(conception of person)就是设法使自己的利益成为最大化的人(maximizer)。但不可否认,这样一种经济系统的产生的“人观”造就了一套独特的“品质构造”,以至使得生活在该系统中的

人不自觉地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违背诚实赚钱的道德训诫,贪婪攫取固然可以被看成是由市场社会所撩动起来的个人的雄心壮志,但欺诈、虚伪却也因此像摆脱了牢笼的偷儿,在人们生活世界的天地里奔跑撒欢。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揭示的“专门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1]似乎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在西方,依韦伯的了解,这样一种市场社会的发展,是由“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彻底颠覆了宗教的“禁欲苦行主义”(asceticism),以至于只剩下经济冲动力的单骑独进的话,那么,在中国,当前虚假欺诈之风的泛滥流行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传统儒家所珍视的诚实守信美德的缺席,确实是改革开放后为我们遗留下来的巨大的精神空白。

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不诚不信的社会中,我们没有理由不借由对传统儒家文化资源的重建来创造一个真实、诚信的道德世界。因此,我们对儒家诚信之德的关注绝非只是为了满足理论雄辩的需要,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我们存在的实感。

其次,从理论方面看,我们之所以要重新阐发儒家的诚信之德并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予以提升和肯定,事实上也深深地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其一是为了反驳马克斯·韦伯对儒家有关诚信之德的偏见乃至谬见;其二乃是基于我们当前学术界对儒家诚信之德的研究缺乏系统性的了解。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也促使我们必得就儒家的诚信之德做一番探究,一方面固然有正于以韦伯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视听;另一方面则希望借此工作而有助于推动对儒家诚信之德的研究的深入。

我们先看第一点。

在传统儒家思想和中国古代商人中,究竟有没有诚实守信的观念和操守?退一步,假若中国古代商人有此诚实不欺的道德品格,则这些道德品格究竟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还是由其自身的传统内部发展而来?这些问题或许在我们今天看来根本就不成问题,然而,它却是当年韦伯研究中国儒教时碰到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儒家传统思想向来讲求与诚与信,就其将诚上升到天道形上学的高度来看,它已远远超出世界上许多民族对诚信的崇奉程度。几千年来,人



们受儒家文化的浸淫、滋溉，已经不仅在言行上，甚至在血脉中，将诚信的要求与生命融为一体。诚是“天之道”，思诚则是“人之道”，而《中庸》的一句“不诚无物”，则将我们的心灵、生命直接提至兢兢惕励，如临深渊的境地。因此，在儒家思想中，诚信之德不仅是“立人之本”，而且也是“立政之本”。诚之德、信之则具有贯天人，合内外，甚至通幽明的品格和功效。

然而，作为一个在西方思想界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却持有一种相反的看法。韦伯对传统儒家的伦理理论如何了解是一回事，但他确实实地认为，中国商人在他们的观念和经商活动中虚伪不实(dishonest)，同时彼此之间也毫无信任可言。韦伯说：

中国人彼此间典型的不信任已为所有观察者所证实，同清教诸教派中对信徒的诚实品质的信赖成为鲜明的对照，即使在宗教团体以外，也可以信赖清教徒的诚实。[2]284儒教与道教

但韦伯也感到奇怪，一方面是中国商人的“世上绝无仅有的不诚实”，另一方面却是由中国商人组织的批发贸易商行的“显然十分值得注意的可信赖性”^[2]。韦伯由此推断，假如中国商行的各种经营活动是诚实守信的，那么，这种诚实守信也必定是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所致，而不是从中国商人的内部传统中发展出来的。极言之，不是从儒教文化中发展出来的。

要驳斥韦伯的这种见解并不需要多大的气力，因为至少中国明清之际的许多商人的所言所行，历史地证明了韦伯的偏见，甚至无知。远的有日本学者佐伯富、寺田隆信证明了山西商人将诚实不欺看做是自己经商的“金科玉律”；近的则有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对明清商人诚实观念的有力研究。因此，从历史事实上看，韦伯的说法不仅没有道理，而且也是不负责任的。

然而,问题在于韦伯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乃根源于他对传统儒家价值系统的了解上面。韦伯认为,儒家思想缺乏一种内在的价值核心,最为重要的是儒家没有超越的宗教道德的信仰。但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简明扼要地指出的那样,与诚与信在儒家思想中占有中心地位,并且已经上升到了天道的高度,“天道不欺”正是许多中国人信之弥笃的观念,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比较宗教的研究,已经从儒家的价值系统中发现了超越宗教的面向^①,而诚信正是这种超越的宗教道德的一个表现。

至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韦伯的观点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理论上都是难以让人信服的。我们再看第二点:本文之所以要选取传统儒家诚信观念的加以阐发,乃在于当前学术界对有关这一研究课题似乎仍然缺乏一种系统的理论加以说明,人们似乎更多的是从当下的现实之需中转向选取和剪裁有关的儒家的学说,而未注意儒家诚信之德的内在关联及历史发展。无疑的,这样一种工作并非一时一地即可完成,但传统的激活的确需要我们对传统进行系统的审视,以便我们清晰地了解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状况。麦金泰尔认为,我们必须借助黑格尔的“哲学式的历史”(philosophical history)这一概念来贯通历史与现实。因为我们要想真正地了解我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发展史,我们就只有将这一文化的精神结构以叙述史的方法把它铺陈出来。藉由这种铺陈,我们方能了解到我们今天所处的实际状况,并且弄清楚为什么会处于这样一种状况。

毫无疑问,我们没有奢望仅仅通过对儒家诚信之德的研究便能轻易地帮助我们摆脱当前的虚欺不实之风,但它却是我们了解自身和历史,以便更清楚地走向未来的一项富有意义的工作。

二、为什么我们要选取以“四书”为中心来进行阐释?

事实上,当我们回答了何以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儒家诚信之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之后,接下来自然要对何以选取“四书”这一问题进行回

^①最新研究,请参看 H·L·Yearley. 孟子与阿奎那[M].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2.



答。

我们准备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

首先,在说明“四书”的重要性之前,让我们简单弄清楚“四书”并行的由来及其发展。

“四书”就是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中,除《论语》、《孟子》外,《大学》、《中庸》的成书年代目前在学术界尚无最后的定论,但取其最大下限,大体可以说在秦汉之际已无问题,但当时并无“四书”之说。到汉代时,《论语》、《孟子》虽未列入经书,但其地位显然在其他书籍之上。据《十三经注疏》之《孟子注疏》题辞解上云:

至孝文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出于屋壁,《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犹广立于学宫,为置博士。由是《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皆置博士。[3]孟子注疏

同时,《中庸》在汉代也受到重视,《汉书·艺文志》已载有《中庸》说二篇,到了唐代,《大学》、《中庸》已受到韩愈的重视,并将之与《论语》、《孟子》并列,到了北宋已进一步把这四本材料作为教育门生的基本教材,朱子则把它们独立出来分别予以注解,成《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也叫“四子书”,同时也有学者称之为“论孟学庸”。

需要说明的是,北宋初,《五经正义》仍然是官定的“经书”注疏,它们是《易》、《诗》、《书》、《礼记》、《春秋左传》,但北宋同时组织人重订了《孝经》、《论语》、《尔雅》三疏,这种官定经注范围的扩大和“经书”的重新注释,大体可以看做是宋代文化繁荣的一种标志。北宋的二程及南宋的朱熹选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作为经书,并为之作注,使之与“五经”并列,从此而有了“四书”、“五经”的说法。事实上,在以后的教育发展,“四书”已经取代了“五经”的地位。朱子就明确地认为经书并非绝对必要,最重要的是要“明理”,明“圣人本意”,朱子说:

借经以通乎理耳。理得，则无俟乎
经[4]卷十一，192宋子语类

若晓得理，则经虽无，亦可。[4]卷一〇三，2607宋子语类

依朱子之意，读经的目的在明理，若理不明，则再多经书亦无用处。所谓明理则在于弄清圣人作经的本意和用心，显然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乃是探究圣人本意的最直接的材料。到光宗绍熙之年(1190年)，朱子把这四种材料及其注释汇编成一书，这便是《四书章句集注》的由来^①。

其次，当我们简略地说明了“四书”并行的由来以后，现在可以就为何我们要选取“四书”为中心来阐释儒家诚信之德的理由稍作说明。

简单地说，其间的理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四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和重要性，二是“四书”所贯穿的诚信之德的理论及其特点。

为何要选“四书”？原因是因为“四书”很重要，很有代表性，但“四书”为何重要？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朱子编撰“四书”的用心及其所蕴涵的哲学意义上来作一了解。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说：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5]2《大学章句序》

此段引文虽长，但核心却只有两句，大体亦可以看做是朱子苦心

^①有关说法，本文参考了韩秀丽等著《四书与现代化》一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同时本文也参考了陈荣捷著《朱学论集》1982年版，台湾学生书局，同时请学者参考《周子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注释“四书”的实际用心,这就是要对“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有所补益。一句话,就是要通过“四书”对“教化陵夷,风俗颓败”的社会有以净化和扭转。因此,“四书”之作乃借此来彰显修己治人之道,使得治隆于上,俗美于下。毫无疑问,我们若能就“四书”所蕴涵的诚信之德加以揭示、显发,则于“四书”所以“化民成俗”乃有更深入、更妥帖的理解。对于疗救今日社会诚信缺失的弊端,就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

从历史发展角度上看,“四书”的重要性又表现在哪里呢?在“四书”成书之前,按陈荣捷先生的说法,“五经在国家取士与学校教育中仍占极重要的地位,儒学亦仍以五经为社会道德之准绳,但在新儒家思想之发展中,经典权威,则已丧失,在新儒家哲学发展中,朱子转以‘四书’作替代。”^[6]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朱子完成“四书”以后[即绍熙之年(1190年)],自皇庆二年(1313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书”已成为国家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的基本书籍。换句话说,在此后元、明、清三朝的约七百年中,人们已不再像以往那样从五经那里习得知识,而是转向从“四书”中寻求社会道德的准绳。它对整个民族的道德心灵所产生的至深至巨的影响已不言而喻。因为自皇庆二年以后,每朝科试,必以“四书”为教材,私塾里不但要背诵“四书”正文,也要背诵一部分朱熹的注释,科举考试则以朱子的注释作为立论依据和标准答案,因此,“四书”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道德的深刻影响,使得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进行一番深入探究。

然而,从哲学上看,“四书”的重要性又究竟该如何理解呢?人们或以为,“四书”之纂注不过是为了维持儒家的传统,以便从经典中寻求权威而已。但是,“四书”之成立及其所蕴涵的道德教化的重要性更有其哲学上深远的理由,陈荣捷先生对此认为:

四书之刊行，容或偶然。但其哲学意蕴，则至为重大，以其含有：一、脱离五经权威地位之羁绊；二、直探孔孟基本义理之教；三、引介合理之治学（治经）方法。[6]19朱学论集

至此，大概没有人会认为“四书”不值得我们做一番梳理了，而这番梳理不论从哪一个角度都是颇富理论意义的。

问题恰恰在于，人们似乎并未从诚信的角度直探“四书”的内在逻辑及其发展，以便展示“四书”中诚信之德的规模和特点。从《论语》将信看做是立人之本，为政之本，到《大学》将诚意、毋自欺看做是修身的实践工夫的法则和要领；从《孟子》的“思诚者，人之道”到《中庸》的“不诚无物”、“至诚无息”，“四书”所表达的诚、信已然不是人们口头上说的简单的一个道德德目了。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假如仅仅从一种规范、原则的角度来理解“四书”的诚、信，也已多少遮蔽了“四书”有关诚、信的丰富内涵。事实上，诚、信在“四书”中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修养工夫，而且同时也是一种伦理的本体（所谓“诚者，天之道”）；不仅是关涉一己的内圣，而且也是安立家国天下的外王（所谓“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诚不仅是天之道，而且也是人之道。如此复杂、丰富的内涵固然不是肤浅之辈仅以一道德条规就可概括的。正是有见于此，我们选择以“四书”为中心来研究儒家的诚信之德就更觉其必要。

言及于此，则我们尚有一点须做出交待，朱子竭其一生精力，订定“四书”替代“五经”以为社会道德之准绳，其中的一个原因，在朱子看来乃在于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往者不明，道统亦晦，故朱子定“四书”以为“入道之序”。但作为“入道之序”，朱子注重的是循序渐进的工夫历程，而并不从时间顺序上着眼，这与本文对“四书”的叙述方式是有所不同的。依朱子，读书须有难、易、首、末的节次，入德也须有轻、重、繁、简的门径，故朱子对此“四书”次第的安排乃以《大学》为先，次而《论语》、《孟子》，最后才是《中庸》。朱子云：